

坦克猫 No.05

导言

关于西夏党项人的灭亡有着各式各样的传说，我所知道的是这样：

那是狗年秋天，成吉思汗率部十万再征西夏。西夏人抵挡不住蒙古的铁骑，于是可汗的军队包围了西夏的都城兴庆府。山穷水尽之际，西夏献宗李德旺依然勇猛的抵抗。他的顽强带来回报。惨烈的攻城战中，可汗受到致命的箭伤。然而病危的可汗却立下遗嘱：

你们在城破之前不可以发丧。

你们要把党项人的上到父母长辈，下到子子孙孙，都干干净净地灭绝、断子绝孙。

你们每次吃饭的时候，都要说：‘干干净净地灭绝、断子绝孙。把他们杀死、灭绝’，一定要说。

可汗死了。蒙古的军队遵照遗嘱秘不发丧。不久围城中的献宗忧惧而死。他的侄子南平王李睨继位，这便是末帝。末帝继位半年后再也无法坚守。末帝对可汗的死并不知情。他奉上祖传金佛出城投降。蒙古的士兵杀死了末帝，蒙古的军队入城屠杀。

就这样，大部分党项人被杀死，余下的再也不敢称自己是党项人。

我曾到过历史上的兴庆府——如今的宁夏。我曾到过西夏王陵。

那是地平线上隆起几个光秃秃的巨大土堆。其中一个土堆前有蒙古士兵掘下的大坑——他们焚毁了王陵之上的建筑，但终于没能掘开地下的世界。

当时，阴暗的气息里，几个土堆在远方的贺兰山和近旁的杂草映衬下给我莫名的伤感。

我想这伤感大概是由进化写入我的基因中——为了在进化中取胜，人类必须既保有灭绝异种的凶狠，又对种族的灭绝、文化的消亡怀有同情。

我看到了灭绝党项人的凶狠。

我希望这凶狠能让我们对所有存留下来的种族和文化施以我们无限的同情。

—— 2010.11.26

目录

导言.....	2
目录.....	4
唯色：心脏的骨头（社会）	5
唯色：杀劫——镜头下的西藏文革（图集·选编）	13
胡平：我的非暴力抗争观（政治）	20
何清涟：云端之上的中国政改梦幻（政治）	24
李歆照：昂山素姬·地球女儿（图集·选编）	30

唯色：心脏的骨头（社会）

原文链接：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0/11/blog-post_11.html

原文日期：2010 年 11 月 11 日

几年前，我在北京的一个网站上开过博客，不及半年被关闭，连个理由也没给，猜得出与话题敏感有关，比如发生在西藏的文化大革命，配上我父亲当年拍摄的那些砸寺院、斗喇嘛的照片[1]，显然是禁区。

那么“和平里藏文”也不能提吗？我本不知其典故，只是在博客上发表去新疆的游记，提起新维文。那是路过南疆民丰县[2]时，被屹立在县城中心的纪念碑所吸引：一栋红色的长方体，基座上浮现着一朵朵象征文革图腾的向日葵，顶部是数面红旗簇拥着毛泽东的头像，中间部分用汉文和一种陌生的文字刻着文革语录“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另有一块石头则明示此碑“始建于一九六八年”。

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确确实实燃遍了大江南北，连如此遥远的边疆小城也被席卷。而 1968 年，据我对同样发生在拉萨的那场“红色恐怖”的了解，正是两派武斗的高峰期。那时候，藏汉人民实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团结，由“亲不亲，阶级分”细化为“亲不亲，派性分”，民族问题反倒变得无足轻重，是不是新疆亦如此？同行的维吾尔友人出生于 1973 年，不太清楚那段历史，对那陌生的文字也只说得是新维文。

俟新疆归来，由网上查到，1960 年以后，北京对维吾尔文实行文字改革，认为老维文缺乏科学性，遂以 32 个拉丁字母取代之前的 36 个阿拉伯字母，创制了一套拉丁化的新维文，废弃了已经使用几个世纪且带有伊斯兰背景的老维文，但由于并不为维吾尔人接受，1982 年起重又恢复老维文，其结果，使得在这二十年里学习新维文的两代维吾尔人，一夜之间，被变成了文盲。而当时除了新维文，还有新哈萨克文、新蒙文等，均都同样命运，有专家不得不承认，这都是“五十年来我们国家在语言文字政策上犯过很多错误”[3]的例证。

一位网名为更敦群培[4]的博巴[5]，在我的博客上留言说当时还推出过新藏文：

用省略法把传统文法的几个主要虚词省略之后，拿其中一个虚词来替代，而这种替代违背了文法的定律，破坏了原来优美的不同语音的交替出现，导致了很多相同发音的高频出现，很不中听，并且错别字频仍。可是，既然文字要改革，那就不管不顾了，一声令下，连小学课本都得这么改。有意思的是，除了课本，受害最深的是《毛选》[6]，因为当时除了《毛选》，其他藏文书都属于‘四旧’[7]的范畴，没有付梓的荣幸。

看来新藏文不同于被拉丁化的新维文，倒很像对中文进行的文字改革，即将繁体中文不断地简体化。我学过最后一批简体中文，简化

到了十分可笑的地步，例如藏人的藏，变成了上面是草字头，下面是“上”，莫名其妙不说，仅从形式而言就很难看。据说老藏文之所以要改革，是因为传统文法太复杂，让广大的“翻身农奴”难以学会，以至于成了被贵族、喇嘛等剥削阶级掌控的工具。尤其是，必须要毫不客气地取消让拉萨贵族们孤芳自赏、高高在上的敬语[8]，似乎那敬语，是剥削阶级在精神上折磨劳动人民的帮凶。

然而，这是不是暗示“翻身农奴”头脑简单、四肢发达，须得重新创制一套简单易学的文字？甚至是讥讽“翻身农奴”很弱智呢？实践证明，文字改革的效果并不如人意，导致新藏文版本的《毛选》错误百出，非常不利于据称已经当家作主的藏族人民融会贯通地学习毛泽东思想。不过身为新一代博巴的我，在幼年时代并未学过新藏文，实际上很多年来，藏地大多数中小学校都取消了藏文课程，使得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六七十年代生人，至今在母语方面还是文盲，自然也就扯不上与新藏文有何相干。

我继续向网友更敦群培求教，他亦继续留言说：

这是一段被遗忘的历史，在参与藏文改革的人中不乏本族的知识人才。当然，能够对文法做改动，其藏文水平应该很不错才行。这次藏文改革好像没有正式行文，它起缘于六十年代末，大概进行了六、七年，是从民族出版社的出版物直接入手的。鉴于民族出版社位于北京和平里，新藏文故被戏称“和平里藏文”，直至文革结束，遭到许

多有名的藏人学者反对，才又恢复传统藏文，新《毛选》只好作废重印。

汉字改革虽然也搞简化，但相对来说慎重得多，对普通话的确定延续了元代的“中原之音”、明代的“中原雅音”、清朝的“官音”以及民国的“国音”，这一脉传承下来的“音”被定为普通话的标准音，并不顾忌是否属于需要全盘否定的“四旧”，惟有少数民族总是成为试验品。

文字是否平等，其实是个很根本的问题。蒙、维文被改革，我是在上大学时听蒙族和维族朋友说的，详情不太了解，而“和平里藏文”是自己亲历过的，所以印象深刻。当时背诵新规则文法时颇费了一些力气的，也听说过“和平里藏文”闹过许多笑话，比如藏文翻译很汉化，没几个藏人听得懂，就会被嘲笑说，怎么搞得像“和平里藏文”？

这“和平里藏文”虽然折腾过一段时间，毕竟又改回去了，容易开怀地忘记不幸的藏人在偶尔的玩笑和幽默中让历史随风而逝，尽管有些辛酸。然而，现如今正在进行着的一些事情，其用意之深远，其手法之高明，让人触目惊心。是的，可以用“触目惊心”这个词来描述，淋漓尽致地被玩弄到刀砍下来时，我们还要充满感激地、热泪汪汪地视凶手为菩萨的地步，噶嘛呢叭咪吽……

现如今？用意？手法？记得有一年，当时我还在体制内供职，作为获得少数民族文学奖的藏族诗人，去云南参加少数民族诗歌笔会，

就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是否应该发掘、发扬，在觥筹交错的宴会上，一个肥头大耳的北京官员毫不掩饰地说，多年前，万里委员长就已经讲过了，少数民族本来没有文字的就不必有文字了，少数民族当中有文字的也应该让它消失了，全都统一使用汉文。“而我，”这个官员环顾着围聚在饭桌跟前洗耳恭听的少数民族诗人，声若洪钟地说：“非常赞同他的意见。”其时，几个穿着舞台上的那种艳俗的彝族服装却不一定是彝族的青年男女，正在又拍手、又翘脚地唱着敬酒歌：“喜欢你也要喝，不喜欢也要喝，管你喜欢不喜欢，也要喝……”

一个民族的文字如同这个民族的生命，怎能如此轻率地，或被越俎代庖，或被大一统？更敦群培，我指的是那个在图伯特[9]巨变的前夜自暴自弃的旷世奇才，他过早离开人世之前留下的遗言，并非如今谬传的“我不愿在西藏。我讨厌西藏！”[10]之类的小器妄语，而是这样一段话：“世上最珍贵的琉璃宝瓶，已被摔在石头上粉碎了；接下来，他们想怎样就怎样，随他们去吧！”这是网友更敦群培专门从藏文传记里为我翻译的，并嗤笑道：那些自以为是的外人，竟以小肚鸡肠来如此揣度一颗深爱着图伯特的心。

我与他成为至交，更多的交流发生在腥风血雨的藏历土鼠年[11]，我找出多年前在拉萨写的一首诗，感觉像是一首献辞却又难以确定要献给谁，其中的两节是：

啊，月光下，他已成为幻影

正在掠过寺院
犹如一把钥匙隐隐发光
却已生锈
怎能打开我的西藏？
.....
我悄悄回头
不禁暗暗心惊
突然，一束光线斜斜而至
落在若有若无的袈裟上
尘埃飞舞
颜色闪耀
西藏竟在时间之外

网友更敦群培却像是从中发现了什么，感喟道：“古汝仁波切[12]说过：时间不会变，只是人在变。对于大多数的博巴而言，‘宁瑞’并没变，只是世道变了。所以 2008 年的这些事情，让人忽然发现黑暗不会永久，忽然发现努力的不只自己一人，忽然发现每个人默默的付出都有回报。更因 2008 年，不仅是你我，全世界也忽然发现西藏竟在时间之外，半个世纪来一直存在，犹如边缘的内核……”

“宁瑞”是博盖[13]，意思是心脏的骨头，恰如图伯特民谣：“去年被马儿摔过，胳膊和腿都没断；今年被恋人摔下，心脏的骨头折了。”

[14]这本是一首情歌，也可以不仅仅看作是情歌。

注释：

[1] 我父亲拍摄的西藏文革照片与我调查西藏文革的纪实文字，2006年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杀劫》一书，同年获《中国时报》2006年度中文创作类十大好书奖。

[2] 民丰县：位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南部，以维吾尔人为主体的民族。此地维吾尔语中为“尼雅”，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主要驿站，1944年被定汉语名“民丰”。

[3] <http://ngotcm.com/forum/viewthread.php?tid=4377>

[4] 更敦群培：Gedun Choephel，1903年—1951年，安多热贡藏人，年轻时赴拉萨哲蚌寺学佛，以后足迹遍布印度等中亚国家，乃佛门奇僧，风流浪子。他是近代西藏著名的画家、诗人、历史学家、地理学家、性学家、翻译家，被公认为20世纪藏人自由主义思想家、人文主义者。

[5] 博巴：藏语，藏人。

[6] 《毛选》：即《毛泽东选集》，共五卷，被认为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体现，又称“红宝书”，中共建国之后是全中国的必读书，尤以文革最甚，并被译成无数文字。

[7] 按照毛泽东的思想，不破不立，破旧才能立新。于是就有了破“四旧”和立“四新”。所谓“四旧”，指的是旧思想、旧文化、旧

风俗、旧习惯；所谓“四新”则正好相反，意味着共产党代表的一切。

[8] 敬语：在藏语中有一般用语和敬语之别。在一千多年前的藏文文献中就有许多敬语词。敬语的流传是与藏人社会中重身份、重等级的习俗相应的，意味着相当程度的尊敬，尤其盛行于卫藏地区。敬语的存在实际上体现了文明的程度。

[9] 图伯特：即 TIBET，即西藏，包括多卫康三区。

[10] 《老拉萨 圣城暮色》，马丽华著，页 228，江苏美术出版社。

[11] 藏历土鼠年：即公元 2008 年。关于 2008 年震撼世界的西藏事件，我著有《鼠年雪狮吼》一书，2009 年 3 月由台湾允晨文化出版。

[12] 古汝仁波切：指有“第二佛陀”之称的莲花生大士，西藏佛教密宗的宗师，公元 8 世纪从印度来西藏弘扬佛法，西藏佛教徒又尊称他为“邬坚仁波切”。“古汝”为梵语，上师之意。“邬坚”为莲花生大士诞生之地，今为密宗成就者在其法名之前所冠的尊号。“仁波切”的意思是珍贵之宝，藏人对转世再来人间度化众生的高级僧侣的尊称。

[13] 博盖：藏语，藏语。

[14] 藏文版的《民歌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 年。用拉丁文注解这首民歌如下：

Na ning rta phos gyugs pas

Rkang chag lag chag ma byung

Da lo byams pas gyugs pas

Snying gi rus pa chag song

唯色：杀劫——镜头下的西藏文革（图集·选编）

原文链接：<http://woesermiddleway.ti-da.net/e2260145.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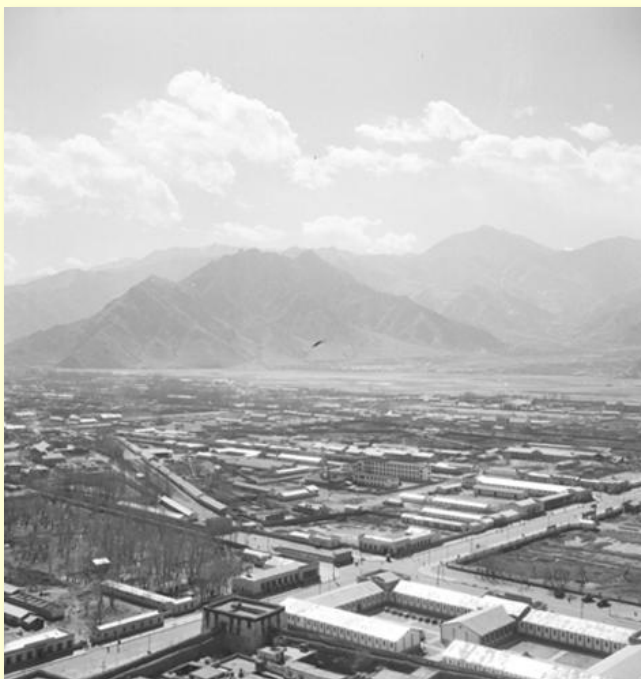
<http://woesermiddleway.ti-da.net/e2260146.html>

原文日期：2008 年 04 月 23 日

这些图片，选自我在 2006 年出版的图文书《杀劫》（文革在西藏的历史影像及其评述）。摄影者是我的父亲。而今的西藏，恐怖文革已然再现。

“杀劫”是藏语“革命”的发音，汉语拼音为“Sha Jie”。传统藏语中从无这个词汇。半个多世纪前，当共产党的军队开进西藏，为了在藏文中造出“革命”一词，“新”的藏语单词和原意为“更换”的藏语单词合而为一，从此有了“革命”这个藏语新词。据说这是因新时代的降临而派生的无数新词中，在翻译上最为准确的一个。

藏语的“革命”在汉语中可以找到很多同音字，我选择的是“杀劫”，以此表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革命给西藏带来的劫难。四十年前，又一场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席卷西藏，于是“杀劫”之前被加上了藏语的“文化”。这个发音，汉语拼音为 Ren Lei，与汉语的“人类”发音相近，所以用汉语表达藏语的“文化大革命”一词，就成了对西藏民族而言的“人类杀劫”。



文化大革命即将到来之前的拉萨。一幢幢类似兵营的房屋修筑在过去的大片草地、“林卡”（园林）和沼泽上，是中共设在拉萨的办公场地和宿舍。据1965年的《西藏日报》报道：拉萨市建成了一个以人民路为中心的、拥有25个较大的建筑物的新市区。20世纪60年代的拉萨正在失却古老而独特的风貌。



1966年8月19日，拉萨召开庆祝文化大革命的大会之后，红卫兵组织遍布开来。最早的红卫兵组织出现在拉萨中学和西藏师范学校，很快红卫兵的成分便扩大化了，一度连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也是红卫兵。他们在老师们的带领下，扛着丑化达赖喇嘛的漫画和铁锹，走在拉萨的大街小巷，宣称要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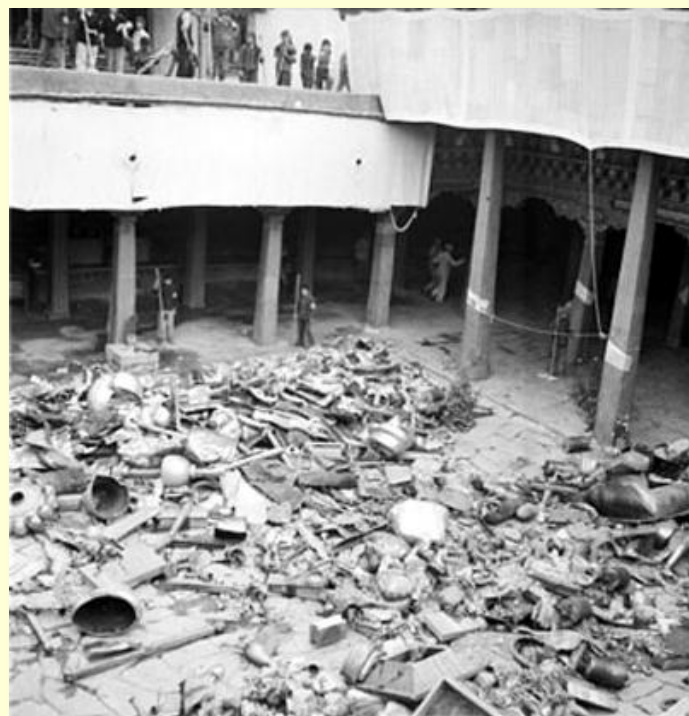


1966年8月24日，被达赖喇嘛誉为“全藏最崇高的寺庙”——大昭寺，遭到红卫兵的破坏。这也是此后蔓延整个拉萨的“破四旧”运动中，第一次公开的“革命行动”。图为参与砸大昭寺的部分红卫兵在大昭寺的讲经场合影，主要来自拉萨中学，有老师，也有中学生；有藏人，也有汉人。



在采访中得知，这个正在挥动铁耙，猛挖大昭寺金顶的女红卫兵，是拉萨中学的学生，藏人，如今是退休干部。

大昭寺的四座铜鑲金顶具有悠久的历史，展现了西藏传统建筑的艺术风格。如今的金顶群为文革之后重塑。



这是大昭寺的前院，遍地堆积着被砸烂的佛像、法器、供具以及其他佛教象征物。楼上楼下都有红卫兵的身影。据当事人告知，当年砸大昭寺的除了老师和学生，还有附近居民委员会的居民和派驻寺院的工作组。事实上，“破四旧”乃是从上到下的组织行为，当地官员的指示是：哪个居委会的地盘上有“四旧”，就归哪个居委会去砸。



这是大昭寺的正面。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使这座古老的寺院发生了巨大变化。所有象征宗教涵义的建筑装饰都被破坏了，手持红缨枪的红卫兵们正在安放毛泽东的巨幅画像和五星红旗，意味着共产主义的新神占领了传统西藏的中心。



这是在大昭寺的讲经场“松却绕瓦”，传统上是举办宗教法会、传授佛法的地方，而此时此刻，原本存放在寺院里的佛教典籍却被红卫兵们堆在这里纵火烧成灰烬。



学生红卫兵们正在奋力地将一个很大的轱辘似的东西推向大火之中，那是装有许多经文的嘛尼轮，属于藏传佛教的象征物之一，位于大昭寺的二楼上，此刻被烧为灰烬。



达赖喇嘛的夏宫——罗布林卡被改名为“人民公园”。据官方报道，1966年8月28日，“雄纠纠的红卫兵和拉萨市五千余名手工业工人、农民、城市居民，以及拉萨各文艺团体、机关革命干部，高举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毛主席语录牌”，把写着藏、汉文的“人民公园”大牌子挂在罗布林卡的大门上方。



在拉萨，第一次游街批斗“牛鬼蛇神”是1966年8月27日，在中共当局的统一指挥下，拉萨市各居委会组织积极分子和普通居民沿街游斗各自辖区内的“牛鬼蛇神”，然后在大昭寺的讲经场集中批斗。图为丹杰林居委会组织的游斗队伍正在经过今天大昭寺对面的大街，被游斗的“牛鬼蛇神”有过去地位崇高的活佛、旧政府的贵族官员等。



被批斗的老人是西藏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噶厦政府的官员噶雪·曲吉尼玛。中共进入西藏之后，他积极向新政权靠拢，但在文革中受尽折磨。他头戴的高帽上用藏文写着：“牛鬼蛇神、最爱夺权的坏人噶雪·曲吉尼玛，彻底消灭”。他身穿旧时的锦缎官服，脖子上挂着女人用的金银首饰和一大摞西藏纸币，右手则拿着一个两面鼓，被讽刺为善于投机的两面派。文革结束后重又恢复高官厚禄，后以高龄在拉萨去世。

批斗他的两个积极分子都是居民红卫兵。



这个头戴圆帽、身裹僧衣、手捧宝瓶的年轻女子是批斗会的中心人物、西藏最著名的女活佛——桑顶·多吉帕姆·德钦曲珍，年仅26岁，刚生孩子不久。她原本于1959年追随达赖喇嘛出逃印度很快又返回西藏，受到毛泽东的接见，长期享有高官厚禄。文革结束后重又成为政治花瓶，是西藏人大副主任。

跟她一起挨斗的老人是她的父母。



站在大昭寺讲经场上挨斗的三人，右为桑颇·才旺仁增，中为崔科·顿珠次仁，左为邦达多吉。

崔科的前胸后背全贴上了大字报，头上的高帽上写着“彻底消灭反革命分子崔科·顿珠次仁”。他其实是积极的合作者，曾被西藏军区授予大校军衔，担任过拉萨市市长、自治区的副主席等。但在文革时被认为与桑颇、邦达多吉等人成立反动组织，斗得很惨，文革刚结束即病故。

邦达多吉穿着魔女的法衣，帽子上写着“彻底消灭反革命分子邦达多吉”。



被斗者察第·次旦多吉原是噶厦政府的“米本”，即拉萨市长，主要负责管理法院和监狱。

在批斗中，他的脖子上套着从前给犯人戴的刑具，用藏文写着“屠杀劳动人民的刽子手”；挂在胸前的大字报上写着“屠杀劳动人民的刽子手，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从前的‘米本’——次旦多吉”。他的手里拿着皮鞭和镣铐，以表示这些都是他过去残害劳动人民的刑具。据说他是“牛鬼蛇神”中被斗得最惨的一个，于文革后期去世。

批斗他的年轻女子是当时有名的积极分子，过去是乞丐，如今天天转经朝佛。



从人物的装束和远处的景致来看，批斗场景显然不是在拉萨城里，而是在附近的农村。

正在低头接受批判的老妇，一手捧着小型佛龕（内装有护法神的塑像），一手拿着法鼓。有人说她可能是一个代言神巫。



文革期间，当局经常举行各种大型集会，为了让“翻身农奴”表达对毛泽东的无限感激，须得人人高举红宝书、语录牌，或者用哈达装饰的毛泽东画像。这其实是一种组织行为。



看见这幅照片，一位藏人说：“我又像是回到了那时候，我也常常坐在这中间。”

另一位藏人则感慨道：“你看，这些窗户是破破烂烂的，这孩子的衣服也是破破烂烂的，还拿着别人给他的发言稿，他知道是什么意思吗？这周围的人都恍恍惚惚的，任人摆布似的，这整个就是西藏的文化大革命。”



政治宣传是中共很重要的手段。当时在拉萨的文艺团体有西藏歌舞团、话剧团、藏剧团、秦剧团、豫剧团和西藏军区文工团，还有不计其数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他们在拉萨街头载歌载舞，向广大“翻身农奴”激情洋溢地宣传毛泽东的革命指示。

胡平：我的非暴力抗争观（政治）

原文链接：<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724>

原文日期：2010 年 11 月 13 日

关于非暴力抗争，我已经写过不少文字。这里，我再做一些补充。

黄万盛先生在《思考法国大革命》一书的序言里讲到这样一段故事：哈佛教授罗尔斯一次在课堂上讲关于“无知之幕”的理论，那是他公正理论的逻辑起点。突然，一个学生举手问到：老师，你讲的很好，我都能接受，可是，这套理论如果碰到了希特勒，怎么办？罗尔斯愣住了，他说：让我想一想，这是个重要的问题。他在课堂上沉思，整个教室了无声息静静地等着，十分钟以后，罗尔斯抬起眼来，严肃而平和地给出了一个答复：我们只有杀了他，才能讨论建设公正的问题。

我对罗尔斯的回答很不满意。需要提醒的是，这里说到的希特勒，当然不是那个维也纳的流浪汉，而是第三帝国的元首。这样问题就清楚了：对于统领雄兵百万并得到相当多德国民众狂热拥戴的希特勒，请问你罗尔斯怎么去杀死他？关键的一点是，当罗尔斯说“我们只有杀了他”时，这里的“我们”是谁？

除非你是斯陶芬伯格伯爵，那位德军上校，1944 年 7 月戈登斯堡刺杀希特勒事件的主角，那多少还有可能。记得当年林彪事件爆发，我们被告知林立果曾经组织暗杀毛泽东，但未获成功，那时我感到非常振奋，也非常惋惜（“惜乎不中秦皇帝”），但我也深知，这种事不

是我辈普通百姓能做的，也不是罗尔斯们能做的。

要么罗尔斯就是把自己当成丘吉尔或罗斯福了。唯有强大民主国家的领袖才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去杀死希特勒。由此可以推出，民主国家有权先发制人（象布什总统发动伊拉克之战），最好是对极权国家的独裁者实施斩首行动。既然那是对付希特勒的唯一办法，因而没必要非等到希特勒发动世界大战，造成严重恶果后再动手。我疑心罗尔斯肯不肯把自己的理论推这么远，但是按照他的答复，他似乎没有理由不推这么远。

但问题是，如果你罗尔斯既不是斯陶芬伯格，又不是丘吉尔或罗斯福，那又该如何是好呢？假如你是个德国人，是个拒不接受纳粹那套邪恶理念的德国人，比方说，你是德国的哲学家雅斯贝尔斯，你该怎么办？你能怎么办？汉娜·阿伦特对她这位哲学导师在纳粹时期的表现给予很高的评价，而雅斯贝尔斯那时的表现恐怕连非暴力反抗都谈不上，至多是非暴力不合作而已。但是在当时，能做到这一点已经非常不容易。我想，如果换成罗尔斯，大约也只能做到这一点。

假定罗尔斯是希特勒治下的犹太人，那情况就更糟糕了。1938年11月，甘地曾经建议犹太人以他为榜样，用非暴力方式反抗希特勒。犹太领袖马丁·布伯很不以为然，写信反问：“圣雄，你知道不知道，什么是集中营，那里发生着什么事？集中营里有哪些折磨人的刑罚？有哪些缓慢的和快速的杀人方法？”布伯指出：对于那些不明事理的人，可以采取行之有效的非暴力态度，因为使用这种方式有可能

使他们逐渐变得明智起来。可是要对付一个万恶的魔鬼就不能这样了。

布伯的反问看上去很有道理，但问题是，对犹太人而言，如果非暴力抗争对希特勒这类政权是无用的无效的，那他们又该怎么办呢？用暴力吗？你若对犹太人建议，说你们应该杀死希特勒，这和晋惠帝得知老百姓没米饭吃被饿死，于是建议老百姓去吃肉有什么区别呢？

很明显，在非暴力抗争很难进行的地方，暴力抗争往往就更难进行。我们务必要记住这一点。

现在，人们一谈到非暴力抗争的无效用，总是拿希特勒政权做例证。是的，纳粹政权不是被非暴力抗争击败的，而是被暴力击败的；但不是被犹太人、被德国人的暴力抗争击败的，而是被盟军的暴力击败的。如果希特勒不急于发动世界大战，那又怎么办呢？

我在“我为什么写《论言论自由》”（1987 年）一文里讲到，在 1973 年，我第一次读到威廉·夏伊尔的《第三帝国兴亡》时，我想到的问题就是：要是当年希特勒在进行军事扩张时稍微更有耐心一点，结局又将如何呢？或者说，假如希特勒并不一味向外扩张，而只是不断地加强对内的控制，那么德国人民还能摆脱纳粹的统治吗？当人们不幸落入了现代极权主义的魔掌之中时——例如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人，尤其是在毛时代，我们该怎么办？难道我们就只有等着外国军队打败暴政把我们解放出来吗？难道我们自己就注定了不可能进行任何有成效的抗争吗？假如说一个国家陷入极权主义的魔掌，它还可以指望着别的国家来解救，但要是整个世界都陷入极权主义的魔掌，那

是否意味着除了外星人来解救，否则就只有永远地生活在暴政之下吗？自由如果是赢得起输不起的，那就太危险了。

正是出于对这种极端处境的思考，我坚信，极权主义一定是可以从内部战胜的。作为普通人，我们一定是能够对之进行有成效的抗争的。我相信事在人为。所谓事在人为，有两层意思。一是说我们自己一定能打开出路，二是相信极权统治者一定会犯错误。从理论上讲，极权主义或许能把自身完善到天衣无缝、无懈可击的地步，但极权统治者也是人，而人总是要犯错误的。极权统治者必定会由于自身的愚蠢与任性而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从而为追求自由的人们提供可乘之机。

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极权统治不是凭空建立的。极权统治是利用人们身上的弱点建立起来的。但同时，极权统治也是利用人们身上的优点、利用人们善良的愿望建立起来的。这些人终究可以从自己的经验中认清极权主义的面目，从而根本改变他们的政治态度。你可以说希特勒、毛泽东是魔鬼，他们决不可能变得通情达理；但是希特勒和毛泽东都不是凭借他们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来统治我们的，他们都是靠着千千万万的人们对他们的自愿支持来统治我们的，而在这些人之中，大多数还是善良的、通情达理的。我们不可能改变希特勒或毛泽东，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改变那千千万万原来自愿支持他们的人。事实上，非暴力抗争都不是做给对手看的，而是做给公众看的。我们不是寄希望于统治者，而是寄希望于民众。一旦大多数民众放弃了对极权统治者的支持与服从，极权统治者就失去了他的力量。政治制度不同

于建 筑物，它不可能在一经建成后便可以自然地维持其存在。政治制度是活的东西，它时时刻刻需要人们的参与。无论如何，极权统治不可能在失去人们的自觉支持，尤其是最有理想、最有能力的那批人的自觉支持下，依然继续存在下去。必须记住，在构成极权统治那似乎是无可匹敌的威力中，正包含着我们自己提供的一份力量；因此，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当然也就可以削弱它的威力。

这就是我自己的非暴力抗争观的产生过程。自那以后三十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对极权统治，非暴力抗争也是可以发挥作用，取得成功的。八九民运就差一点取得成功。现在有不少人对非暴力抗争又生出种种疑问，我以为这些疑问还是因为对问题缺少根本性的思考。我写下我自己当年的思考过程，或许对澄清问题不无助益。

何清涟：云端之上的中国政改梦幻（政治）

原文链接：<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org/ArtShow.aspx?AID=8604>

原文日期：2010 年 10 月 20 日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前夕，美国 CNN 对温相的采访将海内外对中国政改的期盼推到了最高潮，一些声望卓著的媒体甚至预言政改将成为五中全会的主要话题。18 日发布的中共五中全会公报让人们的期盼降到了冰点，在长达 4,700 字的全会公报里，虽然指出“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但对政改却只在“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这句之后含义不明地泛泛提及：“积极稳妥推进政治

体制改革”。

一切都证明，从 8 月下旬以来的政改期盼，与其说是中国的政治动向，不如说是中国国内及国际社会都需要这一帖精神安慰剂。

温相政改谈话师法邓、江、朱等政治前辈

其实，只要了解中共的政治逻辑，五中全会这个结果一点也不意外。因为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改革几乎都是危机推进型，只有当局者感到不变革无以求存之时，改革才会来临。就中国现在的整体情况而言，社会矛盾虽然日趋激烈，全国群体性事件蜂起。但由于民众缺乏自组织能力与有效的抗争手段，这些规模大小不一的社会反抗基本上都被地方政府有效地遏制或消弥。只要在刚性维稳手段还有效的情况下，所有削弱现行统治、扩大民众政治参与权利的政治改革，如新闻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当局绝对不会让步。

这一切都是极权统治的逻辑所决定的。因为极权统治从诞生之日开始，就依靠暴力（枪杆子）与谎言（宣传）维持，目前可见的事实是：当局正在投入天价维稳费用加强暴力统治，控制互联网，还推行大外宣计划，将粉饰宣传扩展至世界范围内。也就是说，只要政府的财力能够维持这种刚性稳定，政治控制只会越来越严苛。除了发生严重的财政危机，政府维稳的物质手段枯竭，届时中国当局也许会考虑政改图存大计。

温家宝总理放言政改，表示对普世价值的向往，其实是他在任上

经常做的课堂作业。这类话并非只有他一个人在言说，几乎是历届领导人都说过。从邓小平历经江朱再到胡温，除了胡锦涛之外，其余几位领导人都曾先后在各种场合表过对民主与法制的重视与向往。即使是政治强人邓小平，都曾说过“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978 年）只有胡锦涛言行一致，参观西柏坡、回延安、反对颜色革命，公开拒绝西方式民主政治，

其实，西方社会在炒做中国政改这个话题上是隔上一两年就来上一轮。比温家宝更能激起西方社会认同与遐想的是江朱两位。江泽民 1997 年深秋夜访白宫，见到克林顿递给他的林肯亲笔书写的《葛底斯堡演说》原稿，非常高兴地用英语大声朗读。此举赢得了美国人的普遍好感，几乎以为他认同了美国的价值观。铁腕总理朱镕基那充满豪情的话语，如“反腐败要先打老虎后打狼，对老虎绝不能姑息养奸，准备好一百口棺材，也有我的一口，无非是个同归于尽，却换来国家的长久稳定发展和老百姓对我们事业的信心”，“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这些话不仅深深感动了国内人民，还使港澳台与国际社会对他充满了无限美好的憧憬。

为什么人们需要政改做为精神安慰剂？

无论从质还是量上，温家宝的有关民主与政改的言论都没有超出他的政治前辈。但温相从 8 月份以来激起的政改讨论，以及国内外对他的期盼之高却远远超过他的政治前辈。无论是国内的拥温政改派，还是国际上那些见多识广的媒体，都罔顾一个事实：胡温即将卸任，这种看守政府基本不可能再有大张旗鼓从事改革的可能，因为执政的时间表不允许。卸任者与接任者都需要在稳定中交接，这是政治常识。

为什么在社会矛盾日益激烈，政府维稳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人们对中共政府自觉启动政改的期盼反而日益强烈？我想这是出于以下两个原因：

于中国国内公众而言，主要是出于人们对现存政治状态极度绝望，普遍产生政治乏力感。人们找不到任何有效途径减缓社会矛盾，并改善其生存处境。在生态危机日益逼近，精英阶层移居他国者越来越多之时，头脑清醒一点的人已经看到危机在日益逼近。由于当局想尽一切办法剥夺公众的自组织能力，导致整个社会有如一盘散沙，人们只能寄希望于垄断一切资源的执政者能够高尚一次，考量国家利益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以此为契机，解决各种社会矛盾，让中国避免再次遭到暴力革命的倾覆之灾。

于国际社会而言，这些年来有一个共同愿望是希望中国稳定。随着中国经济奇迹掩盖之下的各种问题浮出水面，国际社会还看到：通过国际规则约束中国，使之成为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几乎是个幻想。他们普遍担心中国崩溃后对国际秩序造成的强烈破坏与难民潮（目前

的移民已使欧美各国感到极大压力)。与中国政府对内宣传的完全相反，国际社会其实并不存在一个希望中国崩溃的“反华势力”。

问题是：中国政府早已成了一个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任何民众希望的改革都需要政治精英们放弃自己的利益，这就使得改革在民众与政府之间成了与虎谋皮的关系。

高层为何没有政改动力？

中共高层没有政改动力，出于以下原因：第一，他们坚信通过暴力可控制局面；第二，同舟共济之利益考量。中共党内所谓“派系斗争”历来是海外炒作热点。但事实并不象外界猜想的那样激烈。在利益分属上，中共党内毫无疑问有派系。但既然同坐一条船，船长、大副与水手们还是知道斗争分寸：内部小打小闹可以，闹到翻船对谁都没好处。

根据这些年的精英动向，可按其利益来源和其个人未来布局大致划分为“扎根派”与“出走派”。出走派多是政府部门中与经济沾边的官员，这些人不少已经将亲属移民海外，公布的 118 万裸官并非全部，还有不少属于“现在进行时”；扎根派则多属相对而言的清水衙门官员，以及军、警、国安部门、宣传部门。这些官员既无足够财力与意愿移民，就只能选择坚守。军、警、国安及宣传部门官员捞钱的机会远低于金融、国土及国企官员，职司所在又是维稳，是坚守派中的蛮干群体。但这两派有共同利益，即维持稳定，只是目的不同。出

走派希望藉稳定获得更多机会捞钱，扎根派则是为了维持长久统治，担心失去政权会遭到政治清算与经济清算。目前不成气候的政治反对力量之“不清算”保证，在富有统治经验的中共眼中，有如小儿戏语。因为任何政治和解都是通过力的诉求得在达成。即使流血最少的英国光荣革命，也是英国绅士们依靠剑与剑的谈判达成的。

政改期望的边际效益递减

长期生活在专制政治之下，中国人自然难免怀抱圣君贤相情结。这种情结在 90 年代的具体表现是“中央领导好，地方官员坏”，“中央的好经叫地方这些歪嘴和尚念歪了”。面对现实中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越来越严重的失业及基层政权的黑恶化趋势，人们亟盼明君出现。

由于中国当局在近十余年以来的政治信用越来越差，公众对政府的政治期望已陷入边际效益递减状态：1978 年改革启动之时，人们热切期望邓小平能够引领中国进入新时代；1989 年六四以后，邓小平因背负六四屠城之责，国人期盼江泽民不做儿皇帝的那一天会有大的改革动作；江泽民任内，政府贪腐横行（谚云“江泽民的改革让官员成了百万富翁”），人们对铁腕总理朱镕基寄予了无限期望，希望他能力挽狂澜；到江时代末期，国人开始想“胡哥”盼“胡哥”，如大旱盼云霓；等到胡温上位后，胡的平庸被视为胸有韬略、深藏不露，胡朝拜西柏坡、回延安等政治意涵极强的举动都被一些人解读为江泽

民势力压制胡，胡被迫采取的韬光养晦策略。网友们通过热爱“什锦八宝饭”（温家宝被昵称为“宝宝”）这一词，表达对“胡温新政”的无限希望——在改革以来的几代领导人里面，胡温最幸运，因为民众寄望最长，直到这次五中全会公报发表之后，海内外才算是明白胡温根本无意在任内推动政改。与第二、三、四代中共领导相比，习近平的运气不太好，人们虽早知他大位在望，却已丧失了自愿歌颂的热情——一个别人士刻意怀抱对习氏的激情幻想除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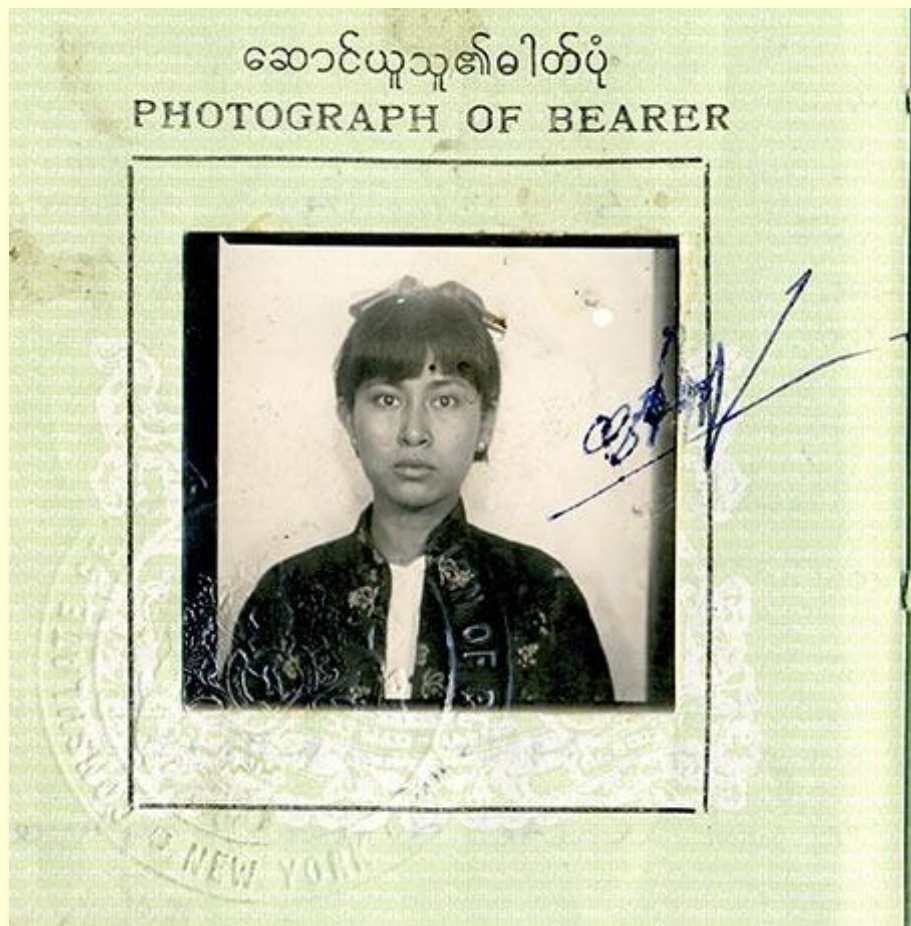
罗斯福讲：“在每一片土地上，时刻都有使人分道扬镳和使人走到一起的种种力量在发挥作用，在为各遂其志而奋斗的时候，我们乃是个人主义者；但在作为一个国家而寻求经济和政治进步的过程中，我们就成了一个整体，不是全体向上，就是一起坠入深渊”。当移居他国为一国的精英群体提供了另类的政治退出机制，并成为精英阶层一种集体选择时，施政过程就与承担政治后果切割开来。在无责任政治的状态中，这种分道扬镳的力量远远大于凝聚力量。依我观之，这种局面不可能会在短期内有所改观，人们只能等待危机深化可能会促使当局者有所觉悟，只是那时可能为时已晚，补天无望。

李歆照：昂山素姬·地球女儿（图集·选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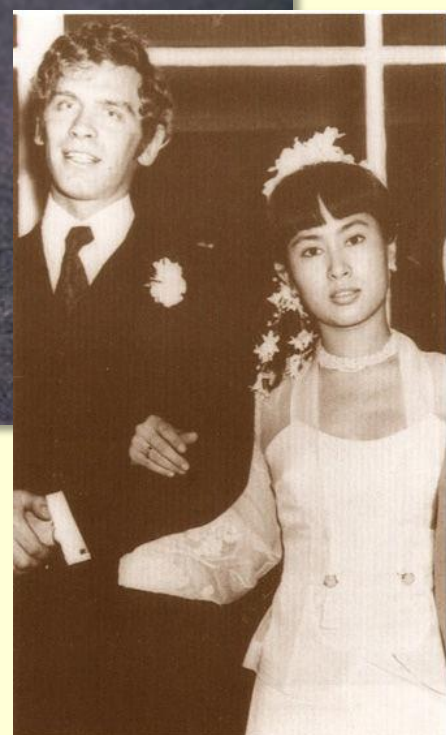
原文链接：<http://www.douban.com/photos/album/36936401/>

原文日期：2010 年 11 月 11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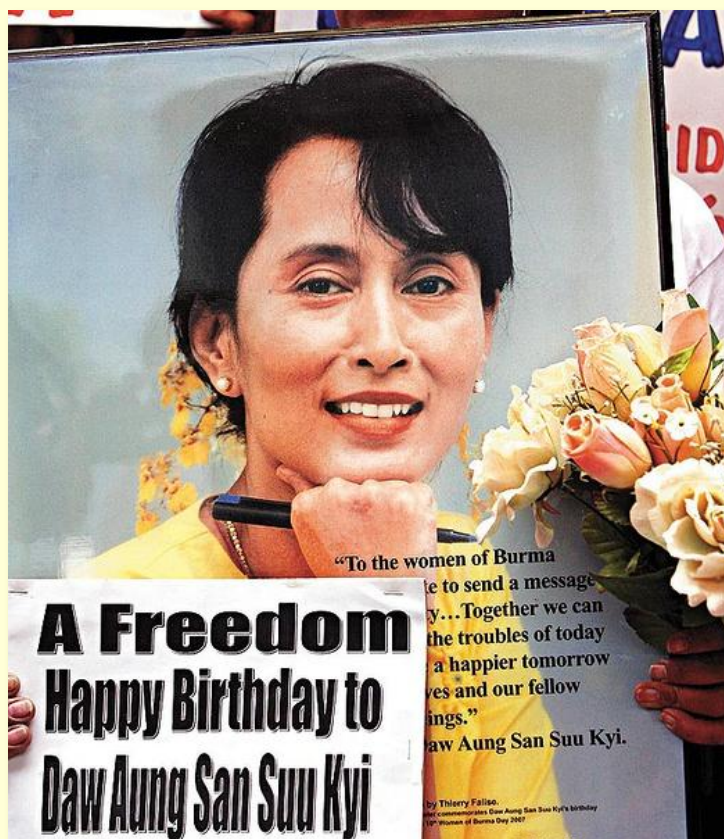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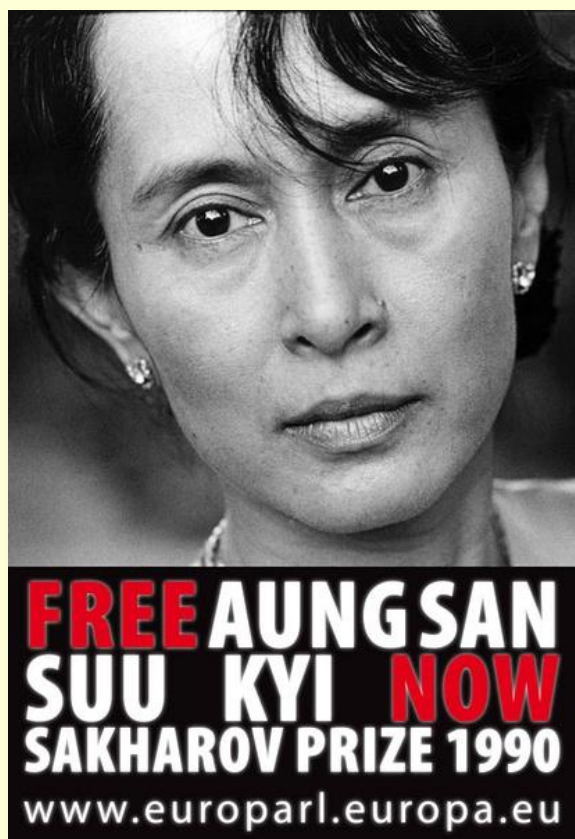
地球女儿。1945 年 6 月 19 日生于缅甸仰光。













2010 年 11 月 13 日，昂山素姬女士出现在欢呼雀跃的民众面前，结束多年软禁。